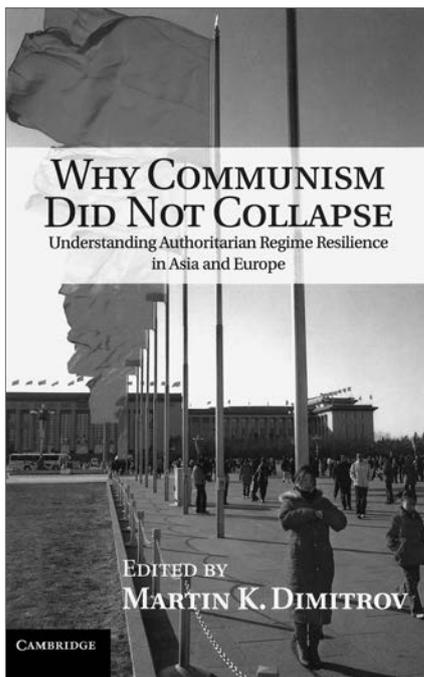


# 社會主義政權的彈性

——評 Martin K. Dimitrov, ed.,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 周陸洋



Martin K. Dimitrov, ed.,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共產主義世界在1989至1991年間經歷了大分流。大部分社會主義政體在這次危機中垮台，另一些則由於種種原因存活下來，並一直生存至今。這次分流提出了一系列學術問題：同樣面臨深刻危機，為甚麼有些共產黨政體能夠及時調整並展示出巨大的「彈性」(resilience)，另一些在激烈掙扎後卻仍未逃脫崩潰命運？那些存活下來的共產黨，又是通過何種手段應對複雜局面並長期執政的？具有「彈性」的共產主義，只不過是長期不可持續中的一種過渡性安排，還是一種正在形成的新型社會制度？圍繞這些問題，比較政治學和歷史社會學已從不同角度做出大量研究。本文所述評的《為甚麼共產主義沒有崩潰：理解亞歐威權政體的彈性》(*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以下簡稱《崩潰》，引用只

共產主義世界在1989至1991年間經歷了大分流，為甚麼有些共產黨政體能夠及時調整並展示出巨大的「彈性」？具有「彈性」的共產主義是長期不可持續中的一種過渡性安排，還是一種正在形成的新型社會制度？

《崩潰》一書對已經崩潰的蘇聯、東歐陣營，以及共產黨仍然執政的中國、越南、朝鮮、老撾、古巴進行比較，將社會主義政體克服危機並長期執政的手段歸結為四類：經濟改革；修改意識形態；擴大政治參與；提升政治可問責性。

註章節和頁碼)一書，正是這一學術傳統下的一部新作。

在比較政治學框架下，《崩潰》一書對兩類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大量比較：已經崩潰的蘇聯、東歐陣營，以及共產黨仍然執政的中國、越南、朝鮮、老撾、古巴。本書編者及作者季米特洛夫(Martin K. Dimitrov)將社會主義政體克服危機並長期執政的手段歸結為四類：(1) 經濟改革：引入市場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提升經濟績效；(2) 修改意識形態：弘揚民族主義或家族血統論，補充和淡化馬克思列寧主義；(3) 擴大政治參與：以修改正式制度、容忍非正式制度等方式，賦予私營業主、技術知識份子等階層政治合法地位；(4) 提升政治可問責性：擴大民主選舉範圍、加強信訪制度，開拓更多的利益表達渠道，提高國家政權對社會訴求的回應性。本書的主要內容，在於細緻描述不同社會主義國家運用這四種手段的強度和具體方法。

本文對《崩潰》的評論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對「共產主義彈性研究」(以下簡稱「彈性研究」)的前身——「共產主義改革研究」(以下簡稱「改革研究」)——做一個簡要回顧，勾勒出彈性研究的學術前史；然後，對《崩潰》的不同章節進行概括和評論，揭示此書對先前研究的超越；最後，對比改革研究和其他相關研究，指出此書因缺乏比較視角和選擇性觀察而造成的兩大主要缺陷：對倖存國家的解釋難以拓展到蘇東；忽視了倖存國家與晚期蘇東國家的巨大相似性。

## 一 何以崩潰：比較視角下的共產主義改革

「共產主義彈性」是近年興起的新話題，相關研究卻可以追溯到蘇東陣營崩潰以前——比較視角下的共產主義改革。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早在1950年代就已開始，但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路徑和結果存在很大差別：經濟改革多次不成功的蘇東在政治改革中崩潰，中國和越南卻轉向了穩固的威權主義。多數共產黨政權很早就展開自我挽救，但努力結果卻大不相同，這就形成了改革研究的基本議題：為甚麼蘇東的改革困難重重，而中國和越南的改革卻相對順利？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是彈性研究的前身。學者提出的經典解釋集中在四個方面：

1、**計劃經濟的僵硬性**。蘇東的計劃經濟遠比中國和越南僵硬。蘇聯各經濟部門之間的聯繫緊密，一個部門的改進總是以全域變動為前提；蘇聯的福利體系覆蓋完整，幹部職工普遍擔心市場化帶來的風險；蘇聯經濟的工業化水平較高，改革需要大量資本和技術投入；蘇聯建立計劃經濟的歷史長達七十年，國民對革命前的市場社會已沒有記憶，改革缺乏發展市場經濟所需的企業家精神和技能。相反，中國由於政治運動和分權實驗的衝擊，不僅沒有建立部門之間聯繫緊密的經濟體，還形成了兩個幾乎不受計劃覆蓋並成為改革引擎的部門：農業和鄉鎮企業。由於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間尚不長，在改革開始時，革命前的經商傳統仍然存

在①。經濟結構的解釋源自中蘇比較，卻具有很大拓展性：越南由於長年戰亂未能建立嚴密的計劃經濟，匈牙利、波蘭等東歐國家經濟國有化程度不如蘇聯，軍重工業比例相對較小。這些國家在計劃體制下的調整空間就比蘇聯大，後共產主義轉型也相對順利②。

**2、政治權威的強度。**政治解釋聚焦於改革領導人的代際因素。1980年代東歐軍政精英已實現技術官僚化，即便在非共產黨政體下也能憑藉關係網絡或專業技能贏得體面地位。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等領導人則成長於「解凍」時期，思想上認同民主社會主義，改革遇挫時很容易質疑蘇共體制。此外，由於程序合法性未能建立，晚期蘇共領導人缺少系統改革所需的個人權威。這些因素致使蘇聯的改革和轉型缺乏強有力的國家領導，容易遇到挫敗或被反改革力量操縱。同時代中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擁有巨大權威的第一代革命家仍在執政；這些精英仍保持意識形態認同，不可能否定自己建立的政權；對文化大革命動亂的痛苦回憶使他們更不可能質疑威權統治③。政治解釋也有一定拓展性：東歐共產主義多為蘇聯植入，建國革命家早已被清洗，新精英又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越南統一和老撾建國都在1975年，蘇東崩潰浪潮來臨時，其第一代領袖仍然在位，情況與中國類似。

**3、民族結構的複雜性。**很少有研究否認民族因素在共產主義改革中的重要性。蘇聯與中國都是多民族國家，但蘇聯的帝國結構遠比中國複雜：俄羅斯人並不佔據數量

優勢，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國人口急劇伊斯蘭化；一些重要少數民族，在工業化水平、與西方聯繫等方面均超過俄羅斯。在蘇聯，計劃經濟事實上具有維持多民族國家整合的功能，地方分權化改革因而充滿政治挑戰：模仿中國設立邊疆經濟特區的動議就因此被否決④。民族解釋也說明了整個蘇東陣營的情況：蘇聯的每一次改革浪潮都最先在東歐引發動亂(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波蘭和匈牙利)，進而導致反改革力量的反彈或政局整體失控⑤。這一解釋還可以拓展到1980年代後陷於地方民族主義而難以自拔的南斯拉夫⑥。相反，中國和亞洲其他的單一民族國家，如越南和朝鮮，都沒有此類問題。

**4、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就與外部世界關係而言，蘇東也有一些妨礙改革的嚴重不利因素。它們處於冷戰最前沿，大量資源投入軍事領域而無法轉化為民用成果。蘇聯缺乏中國那樣的海外華僑資源，嚴重限制了依靠境外資金和技術升級工業體系的能力。在1960至1970年代的美蘇「緩和」過程中，西方給予蘇聯大量資金和技術援助，卻非期然地激勵蘇聯以外部擴張取代國內改革。戈爾巴喬夫啟動改革後的進展也不順利；政治動盪、法制不健全，以及蘇聯社會的仇外情緒，都嚴重影響了外資引入。另外，蘇東的巨額外債以及世界金融組織成員的身份，嚴重削弱了共產黨在改革過程中的自主性，反對激進改革的聲音受到壓制⑦。外部關係的解釋還可以拓展到蘇聯解體後的轉型：在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西方

改革研究的根本關切是「共產主義何以崩潰」，而彈性研究的根本關切是「社會主義何以倖存」。前者在方法上偏重經濟因素，而後者在關注經濟因素的同時，更注意共產黨政權維持統治的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手段。

《崩潰》收錄的文章只是部分符合「彈性研究」的定義，它更像是一部展示學術史發展歷程的作品。第一類文章重述了改革研究的經典結論；第二類文章對改革研究的盲點和誤區進行了補充修正；第三類文章反映了彈性研究的取向和路徑。

的資本注入啟動了新一輪工業化；而在獨聯體國家，工業體系幾乎停止更新，甚至發生大規模的去工業化<sup>⑥</sup>。由於中美關係改善和冷戰的結束，中國和越南都沒有重複蘇聯在對外關係上的舊路。改革具有相對寬鬆的外部環境。

以上是改革研究的四個經典結論。與改革研究相比，彈性研究有三個重大革新。首先，改革研究的根本關切是「共產主義何以崩潰」，其重心是已經垮台的蘇東；而彈性研究的根本關切是「社會主義何以倖存」，其重心是存活下來並繼續執政多年的共產黨政體。其次，改革研究在方法上偏重經濟因素，特別致力於解釋計劃經濟在不同國家的差異化表現，以及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差異化表現；而彈性研究在繼續關注經濟因素的同時，更注意共產黨政權維持統治的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手段。再次，改革研究堅信共產主義不可能改革，它或者以極其僵化的原始形式存在，或者整體崩潰、為資本主義取代；而彈性研究承認，至少在短期內，社會主義政權能夠與市場經濟並存，儘管它對這種並存的前景持不確定態度。

## 二 何以倖存：共產主義的彈性

嚴格來說，《崩潰》一書收錄的文章只是部分符合「彈性研究」的定義，它更像是一部展示學術史發展歷程的作品。全書共十篇獨立

文章，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文章重述了改革研究的經典結論；第二類文章對改革研究的盲點和誤區進行了補充修正；第三類文章則反映了彈性研究的取向和路徑。當然，在廣義上，所有文章都是對「彈性」的研究，筆者的區分只是就它們與先前改革研究的關係而言。

第一類文章以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關於中蘇農業改革比較的第二章為代表。這篇文章簡潔有力地重述了改革研究的四個經典解釋：計劃經濟僵硬性、對外關係、民族問題、領袖權威。改革前夕的中國農民處於城市福利保障之外，而蘇聯農民都是領取國家工資的農場工人，在績效低下的情況下仍然享有較高的福利。在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改革後，蘇聯集體農莊進行了大規模的合併重組，建立了擁有學校、醫院和其他社會化設施的農業城。這讓蘇聯農民對以自負盈虧、個人獨立為前提的市場化改革充滿恐懼並強烈抵制。當中國農業還停留在手工勞動階段、釋放農民積極性即可實現大規模增產時，蘇聯農業已經實現了全面機械化。農業改革要求對機械裝備製造行業進行全面投資和升級，而這又需要與西方緩和關係並求得其援助。地方分權化的農業管理模式則在蘇聯複雜的民族關係面前止步。加之戈爾巴喬夫缺乏權威，導致蘇共高層無法就農業改革形成穩定共識，農業政策變化頻繁但很少得到貫徹執行。這篇文章回答的仍然是「何以崩潰」的經典問題，實際上沒有觸及「彈性」問題。

第二類文章闡釋了改革研究提到但沒有充分展開論述的盲點。眾所周知，東歐的崩潰很大程度上是蘇聯主導的結果，但這種「主導」的具體實現形式究竟如何，以及為何那些不直接受蘇聯控制的國家（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也同時崩潰，卻一直缺乏細緻的解釋<sup>⑩</sup>。

本書選取的兩篇文章詳細分析了崩潰浪潮在蘇東地區跨國傳播的具體機制。克萊默（Mark Kramer，哈佛大學俄國與東歐研究中心）在第六章細化了帝國結構影響蘇聯改革的經典結論：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樣，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又一次最先在波蘭和匈牙利兩國引發動盪；動盪通過蘇聯又傳播到其他保守的東歐國家，最後形成區域性的崩潰浪潮。克萊默還揭示了動盪傳播的途徑：語言和文化同質性便於反對派之間的跨國學習；已經勝利的反對派援助鄰國尚未奪取政權的反對派；蘇聯主動遏制東歐政權中的鎮壓者，為反對派奪權提供保護。這些都有助於解釋為甚麼東歐的動盪很難傳播到東亞。邦斯（Valerie Bunce，康奈爾大學政府系）和沃契克（Sharon L. Wolchik，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的第五章則把相似的分析延伸到後共產主義時代的第二次民主化進程。她們補充提到，民族結構的同質性事實上有利於反對派的動員，從而增加威權政體的不穩定。這與經典解釋對民族因素作用的看法非常不一致。

跨國歷史比較研究的一個傳統難點是如何處理國家之間的相互影

響。這些影響有時候十分重要，足以抵消國家內部結構性因素的獨立作用，但對其具體機制又難以進行系統的經驗描述<sup>⑪</sup>。國際互動對共產主義研究尤為重要：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都學習自蘇聯；社會主義的改革和自救往往又建立在吸取蘇聯教訓的基礎上。蘇聯的影響曾被認為顯而易見而不值得研究<sup>⑫</sup>——如果把影響理解為行政命令和軍事鎮壓，的確如此。這就推動互動研究關注更間接和隱晦的影響機制：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一些研究社會主義國家如何互相學習的著作，中共對蘇聯教訓的總結也逐漸成為一個學術熱點<sup>⑬</sup>。

本書選取的兩篇文章借鑒了社會運動理論的框架，代表了共產主義研究這一新方向。蔡欣怡（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第八章從另一個角度糾正了經典改革研究的誤區。改革研究強調結構性因素，認為中國、越南等國的改革是特定經濟結構產生的必然選擇，這一觀點明顯忽視了行動者的選擇。比如，它很難解釋的一個重要個案是二戰結束時的蘇聯。當時蘇聯具有改革的良好條件：已在戰爭中瓦解的集體農莊系統、戰時鬆弛管制下發展起來的第二經濟，以及斯大林個人的巨大威望。按照經典解釋的理論預期，此時的蘇聯應當自然走上改革道路，成為和1980年代中國一樣的威權國家。事實上，由於執政者的選擇，蘇聯快速回到了戰前軌道<sup>⑭</sup>。蔡文突出了行動者的重要性。1980年代中國意識形態尚未解禁，正式法律政策對民營企業並不友好，為獲得穩定的經

改革研究強調結構性因素，認為中國、越南等國的改革是特定經濟結構產生的必然選擇，這一觀點忽視了行動者的選擇。比如，它很難解釋的一個重要個案是二戰結束時的蘇聯。按照經典解釋的理論預期，此時的蘇聯應當自然走上改革道路。

經典研究認為推進經濟改革並及時以績效合法性取代意識形態合法性，是社會主義政權得以存活的決定性因素。這種觀點注意到了共產黨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決心和行動，卻忽視了它們也在竭力挽救和重塑意識形態合法性。

營環境，大量民營企業與地方幹部合作，註冊為集體企業，形成所謂「紅帽企業」(red-hat enterprises)。隨着經濟的蓬勃發展，這種並不合法的非正式制度形成了規模，最後獲得了中共高層的認可。這並不是一個沒有懸念的過程——如果中共領導人在1990年代初執意打壓民營經濟，中國的改革將完全是另一種局面。

高敏(Mary Gallagher，密歇根大學政治學系)與漢森(Jonathan K. Hanson，錫拉丘茨大學政治學系)的第七章則運用博弈論模型強調了行動者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經典研究認為，社會主義或者停留在朝鮮模式，或者轉向完全的民主政體，不可能存在任何中間狀態的局部改革。在經典研究中，行動者的偏好永遠固定，完全機械地服從僵硬的結構。也正是這樣的理論「指導」了蘇東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sup>14</sup>。高敏與漢森則爭論說，社會主義政體的執政者會出於兩種動機主動改革：一是擔心權力階層以外「無權民眾」的反抗，後者雖然不掌握國家機器和政策制訂，卻能通過公開暴動或「弱者的武器」削弱統治；二是執政者本身的偏好也會變化，一定情境下他們會通過發展生產力而不是限制產品分配範圍來擴大自身利益。

第三類文章代表了彈性研究的焦點：從蘇東崩潰至今的二十多年間，那些倖存的社會主義政權是如何維持其政治地位的。本書給予意識形態重要位置：社會主義政權曾極端依靠意識形態合法性，許諾能在遙遠未來實現的完美社會，但這

種合法性隨着經濟停滯而瓦解，造成共產主義的危機<sup>15</sup>。經典研究關注經濟變遷，認為推進經濟改革並及時以績效合法性取代意識形態合法性，是社會主義政權得以存活的決定性因素。這種觀點注意到了共產黨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決心和行動，卻忽視了它們同時也在竭力挽救和重塑意識形態合法性。它也沒有涉及幾乎未作經濟改革的朝鮮和古巴。

本書收錄的三篇文章詳述了後共產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提斯瑪尼諾(Vladimir Tismaneanu，馬里蘭大學政府與政治系)的第三章指出了共產黨國家重建意識形態的三種選擇：蘇聯放棄馬列主義，接受民主社會主義；中國沒有明確修改其意識形態，但以民族主義適度補充馬列主義；朝鮮則走向封建王朝統治，以家族血統論取代了社會主義話語。阿姆斯特朗(Charles K. Armstrong，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第四章界定了朝鮮意識形態的三個要素：民族主義、家族血統論和先軍政治，認為意識形態轉型是朝鮮多次經歷經濟癱瘓而未崩潰的重要原因。季米特洛夫(杜蘭大學政治學系)在第一章區分了中國—越南與朝鮮—古巴的民族主義：前者的進攻性較弱，以實現民族復興為主題；後者帶有軍國主義色彩，強調外部威脅。

社會主義政權的另一個自救手段是提高政治可問責性。以往研究已經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騰飛，有賴於具有「嵌入性自主」的「防衛性政體」。這類政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能夠不受國內主導階級

的狹隘利益制約而追求民族發展目標；這類政權又必須具有一定嵌入性，能夠感受並回應社會壓力而不濫用其自主權力<sup>⑩</sup>。

本書所收錄的另外兩篇文章，則進一步對社會主義政權感受和回應社會壓力的具體機制——選舉和信訪制度做了深入分析。阿布拉密(Regina Abrami，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系)、馬列斯基(Edmund Malesky，杜克大學政治學系)和鄭宇(康涅狄格大學政治學系)的第九章比較了中國和越南的選舉制度，認為越南政權的可問責性高於中國：前者的共產黨高級機構更分權化，行政與政黨的區分更清晰，代議機構更多受到公眾監督，選舉更有直接性，候選人標準更寬泛。

季米特洛夫的第十章比較了中國和保加利亞的信訪制度。冷戰時期政治控制嚴格，民眾只能通過體制內的信訪渠道有限地表達不滿。1980年代後期街頭政治興起，信訪制度受到大眾冷落，失去約束表達利益訴求和排遣不滿情緒的安全閥作用。兩國在這一時期的信訪量急劇下降，其結果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崩潰，中共也遭遇嚴重政治危機。但在1990年代後，中共吸取自身教訓，開始加強信訪制度，通過增加資金投入、強化幹部懲戒、將民眾抗爭引向地方政府等方式，提高信訪制度的回應性。這篇文章的優點在於它的多重比較視角，揭示出信訪制度並非只在中國、越南等國存在，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普遍性制度設置；信訪制度在國家之間、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之間

的變異；信訪制度本身不足以維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只有在改進之後才能實現其政治功能。

綜上所述，相對於解釋共產主義崩潰的經典文獻，本書所收錄的彈性研究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新的推進：(1)經典研究承認共產主義崩潰可在不同國家間傳播，本書則闡釋了傳播的具體機制；(2)經典研究認為改革路徑取決於特定經濟結構，本書則強調了執政者主觀選擇相對於結構的獨立性；(3)經典研究將改革界定為從意識形態合法性向績效合法性的轉變，本書則看到社會主義政權拯救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努力；(4)經典研究強調政權對社會壓力的回應性，此書則分析了這種回應性的制度表現形式及其跨時空變異。

### 三 本書及「彈性研究」的弱點

在做出學術拓展的同時，彈性研究相比先前的崩潰和改革研究也有不足之處。總的來說，彈性研究缺乏國際比較視角，更多關注研究者感興趣或具備知識的個別國家，比如中國、越南、朝鮮。在許多情況下，它只是描述一些看似有利於鞏固共產黨政權的制度或政策，然後憑經驗認定它們有助於增強「彈性」。與先前的改革研究以及同時代的後共產主義轉型研究(以下簡稱「轉型研究」)<sup>⑪</sup>相比，這一研究角度明顯缺乏社會科學理論框架下的宏觀跨國比較分析，而更像是針對具體國家的區域調查報告。這種

本書闡釋了共產主義崩潰可在不同國家間傳播的具體機制；強調了執政者主觀選擇相對於結構的獨立性；看到社會主義政權拯救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努力；分析了政權對社會壓力的回應性的制度表現形式及其跨時空變異。

中國和越南以民族主義補充和淡化馬列主義，已經是學術界廣泛接受的常識，但事實上這並不是東亞國家的發明，蘇東早已着手推動這一轉型。值得解釋的變異是，為甚麼蘇聯、朝鮮和中國復興民族主義的進程有巨大差別。

情況固然與蘇東共產主義崩潰後研究個案數量大幅下降、剩餘個案異質性不足有關，同時也是理論和視野局限所致。

缺乏比較視角容易造成兩個問題。首先，彈性研究偏重於探索現存共產黨維持統治的技術性手段，而不追問這些手段得以奏效的結構性背景。事實上，多數所謂「彈性手段」在蘇東早已廣泛使用（至少是曾經嘗試使用），但眾所周知，這些國家最終並未表現出多大的彈性。其次，彈性研究只看到少數國家從危機中存活下來的事實，卻未看到它們與後極權時代蘇東政權在政治結構上日益增強的相似性。選擇性觀察的結果是，它所分析的差別或特殊性很可能是局部和枝節性的，而內生於社會主義制度、驅動多數共產黨政權發展和變化的結構性動力卻被忽視。

以意識形態問題為例，中國和越南以民族主義補充和淡化馬列主義，已經是學術界廣泛接受的常識，但事實上這並不是東亞國家的發明，蘇東早已着手推動這一轉型：「大撤退」（Great Retreat）理論認為，蘇聯從1930年代就開始以復興俄羅斯古典文化的方式局部重建其意識形態，並在二戰期間達到巔峰；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在1960年代以後亦有類似的發展趨勢；甚至蘇聯的東歐衛星國也在不引入反俄內容的前提下弘揚愛國主義<sup>⑭</sup>。這裏值得解釋的變異是，為甚麼蘇聯、朝鮮和中國復興民族主義的進程有巨大差別：蘇聯在1970年代最終止於其帝國框架而無法持續推動俄羅斯化<sup>⑮</sup>；朝鮮徹底去除了馬列主義話語並建立王朝

政治；中國則居於兩者之間，賦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更多的民族國家形式。顯然，民族結構的複雜化程度影響了民族主義話語的塑造，使不同社會主義國家施展其彈性的空間大不相同。民族主義的確是發明的，但不能夠任意發明，而是受各種社會條件制約<sup>⑯</sup>。

提升政治可問責性的努力也不局限於中國和越南。西方比較政治學者早在1980年代就已經提出，選舉、信訪和擴寬入黨資格是共產黨政權應對合法性危機的三個最常規舉措，而不是個別社會主義國家的發明<sup>⑰</sup>。正如季米特洛夫在〈結論〉所說，信訪制度本身並不足以確保國家的可問責性，而是國家對社會的回應性決定了信訪制度能否充分運轉（頁300-301）。社會學家曾經提出影響政權回應性的結構性因素：面臨地緣政治競爭、意識形態強烈自信、有較高合法性、受軍國主義或擴張主義控制的政權，最容易忽視社會壓力而濫用其自主性<sup>⑱</sup>。這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時期的蘇聯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都建立了信訪制度，但國家仍然缺乏回應性。描述政治可問責性的具體形式十分重要，但只是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只有揭示這些制度的跨時空變異，並從結構角度解釋這種變異，才能對共產主義政體的生命力有更深刻的認識。崩潰國家和倖存國家之間的比較，是彈性研究的一個盲點，而本書關於中國和保加利亞信訪制度的比較則是一個出色的例外。

如前所述，彈性研究的另一個弱點是選擇性觀察，片面強調倖存社會主義政體的特殊性，忽視其與

蘇東國家特別是晚期蘇聯在政治結構上的共性。雖然彈性研究大多不否認倖存社會主義政權的前景仍具有不確定性，但其前提假設是這些國家已經從根本上偏離了蘇東的政體特徵，成為一類新型社會制度。除了本書提到的四個手段，較新的彈性研究還努力發掘歷史，試圖說明這類政權甚至在尚未奪取政權的階段就已經不同於蘇東。比如，中國和越南共產黨都有漫長的游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歷史，兩黨從中取得的分權管理經驗有利於駕馭改革的複雜局面<sup>23</sup>。又如，許多東歐革命領袖沒有後代，而朝鮮領導人革命時期就已在經營其家族勢力，為政權後來的世襲化轉型奠定了基礎<sup>24</sup>。

這些研究所揭示的現象是真實的，但其前提假設可能存在問題。政治社會學理論認為，極權政體大多具有「蜜月期」：政權有較高的意識形態自信，魅力型領袖仍執掌權力，通過革命取得政權的精英具有不受質疑的合法性。即便在蜜月期過後，極權政體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可以通過塑造績效合法性等手段繼續維持慣性<sup>25</sup>。只有在上述優勢完全喪失後，它的危機才會到來。我們可以注意到，倖存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比較年輕的，其建國時間比蘇聯要晚三十甚至六十年。這些國家政治精英的代際連續性也很強，政權至今仍掌握在革命元勳或與革命元勳有密切關係的精英手中。這與軍政精英已完全實現技術官僚化的晚期蘇東有本質不同。目前就斷言兩類政體已經完全分道揚鑣，恐怕為時尚早。

事實上，在差異之外，我們的確可以觀察到兩類政體之間的許多共性。以倖存國家中建國時間最長的中國為例，過去二十年的中國與1960至1980年代的蘇聯存在着許多政治方面的相似性，比如最高威權削弱、國家默許腐敗以換取政治穩定、國家日益從行政官僚中選拔政治領導人、政治科學發展繼續受到嚴格限制、民族主義升溫等<sup>26</sup>。這些相似性都說明，至少到目前為止，包括市場經濟在內的各種彈性手段並沒有解決合法性危機這樣的結構性問題，而這些問題恰恰是蘇聯體制內生的，很可能屬於社會主義政體的普遍性而非蘇東國家的特殊性，甚至不以經濟市場化等因素為轉移。

西方學者曾把共產主義世界視為具有共同運行規律的統一整體。這一學術傳統下產生了許多經典著作，比如吉拉斯(Milovan Djilas)關於新階級的研究，希克(Ota Šik)關於共產主義政治體制及「第三條道路」的研究，塞勒尼(Iván Szelényi)等人關於知識份子與政治幹部關係的研究，科爾奈(János Kornai)關於短缺經濟的研究<sup>27</sup>。隨着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分野的擴大，這一研究路徑暴露出一些預測上的錯誤，比如過份高估國內階級對立的作用、忽視國際競爭的示範性壓力、對領袖精英偏好的假定過於僵化、對革命前歷史遺產的分析不足等，這些研究也逐漸被轉型研究和彈性研究取代。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這些研究，並借鑒其優點：跨國比較視角、政治經濟學分析手段，以及跨越文化地理差別尋求普遍規律的決心。

倖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建國時間比蘇聯要晚三十甚至六十年。這些國家政治精英的代際連續性也很強，政權至今仍掌握在革命元勳或與革命元勳有密切關係的精英手中。這與軍政精英已完全實現技術官僚化的晚期蘇東有本質不同。

彈性研究必須建立在與蘇東充分比較的基礎上，建立在對兩類政體共性特徵有深刻認識的基礎上，還需要借鑒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社會運動、比較政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而不能只是憑藉經驗常識搜集資料。

當然，筆者並不是否認彈性研究的意義或認定其基本假設完全錯誤；歷史發展完全可能如它所預測，例如中國、越南等國基於獨特的歷史文化遺產和有利的國際環境，借鑒蘇東的發展教訓，在系統改革的基礎上擺脫「蘇聯基因」、形成一種新型社會制度。筆者的觀點是，這樣的研究必須建立在與蘇東充分比較的基礎上，建立在對兩類政體共性特徵有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彈性研究還需要借鑒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社會運動、比較政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而不能只是憑藉經驗常識搜集資料。隨着中國等國家改革的深入，彈性研究和轉型研究將擁有更豐富的議題和資料。

本書還有一個弱點，就是選文質量參差不齊。白思鼎、克萊默、蔡欣怡和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文章有豐富的經驗素材並借鑒了相關社會科學理論，阿布拉密、馬列斯基和鄭宇的文章較多依賴正式官方文件；而高敏與漢森的文章幾乎沒有提供新數據，提斯瑪尼諾的文章則缺乏原創性，對蘇聯意識形態瓦解進程的描述並沒有超出該領域的名著《俄國與西方思想：戈爾巴喬夫、知識份子和冷戰的終結》(*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sup>②</sup>，而阿姆斯特朗的文章更像是政策研究報告。但不論如何，《崩潰》一書提供了比較清晰的學術發展脈絡，一些選文也反映了彈性研究的最前沿趨勢，值得對這一領域有興趣的讀者閱讀。

## 註釋

① 幾乎所有涉及中國和蘇聯改革經濟比較的主流文獻都會提及這些因素，代表性文獻參見Minxin Pei,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eter Nolan,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lanning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lin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 1。

② 關於越南，參見Yu-shan Wu and Tsai-wei Sun, "Four Faces of Vietnamese Communism: Small Countries' Institutional Choices under Hegemon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 no. 4 (1998): 381-99；關於東歐，參見W. W. Rostow,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A Technological Time Warp", in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ed. Daniel Chiro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63-64。

③ 關於東歐精英技術官僚化，參見Gil Eyal, Iván Szelé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Verso, 1998), chap. 1；關於「解凍」的影響，參見Robert D.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關於建國精英的政治認同，參見Stephen Hanson, "Gorbachev: The Last True

Leninist Believer?” , in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33-59。關於領袖因素的較新概括，參見Allen C. Lynch, “Deng’s and Gorbachev’s Reform Strategies Compared” ,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 2 (2012),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Dengs-and-Gorbachevs-Reform-Strategies-Compared-15577>。

④ 關於二戰後蘇聯人口變遷，參見Anderson Barbara and Brian Silver, “Demograp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World War II on the Non-Russian Nationalities of the USSR” , in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the Soviet Union*, ed. Susan J. Linz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1985), 207-42; 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chap. 2 : 關於蘇聯民族地理結構及設立特區的爭議，參見Anders Åslund,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The Soviet Reform Process, 1985-8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8-39 : 關於蘇聯民族問題對經濟政治改革的箝制，參見Philip G. 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 *World Politics* 43, no. 2 (1991): 196-232。

⑤ 關於東歐社會主義改革與瓦解，較全面的概述可參見Ben Fowkes,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⑥ 關於南斯拉夫經濟發展中的民族問題，參見Svetozar Stojanović, *The Fall of Yugoslavia: Why Communism Failed* (Amherst, NY: Prometheus, 1997) : 較全面的總結，參見Viachaslau Yarashevich and Yuliya Karneyeva,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Break-up of Yugoslavia” ,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6, no. 2 (2013): 263-73。

⑦ 關於軍備競賽及帝國負擔的影響，可參見David Hollo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關於蘇聯對「緩和」的利用，參見David Holloway, “War, Militarism and the Soviet State” ,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6, no. 1 (1980): 59-92 : 關於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引進外資的困難，參見Lawrence P. King and Iván Szelényi, “Post-Communist Economic System” ,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6-18。

⑧ 關於後共產主義國家吸引外資和二次工業化的分析，參見David Lane, “Post-Socialist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Impact of Global Economic Crisis” ,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35, no. 2 (2010): 218-41。

⑨ 關於東歐鉅變的經典解釋，參見Ben Fowkes,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⑩ 關於歷史比較分析中的個案互動問題，參見John H. Goldthorpe, “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Macrosociology: A Debate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 ,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vol. 16 (1997): 1-26; Matthew Lange, *Comparative-historical Methods* (Los Angeles: Sage, 2013), 79-84。

⑪ 比如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1-2。

⑫ 關於中國對蘇聯的總結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學習，參見Thomas P. Bernstein and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Barbara J. Falk, "From Berlin to Baghdad: Learning in the 'Wrong' 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The Global 1989: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ed. George Lawson, Chris Armbruster, and Michael Co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3-70。

⑬ 關於二戰結束以及戰後初期的蘇聯經濟，參見Sheila Fitzpatrick, "Postwar Soviet Society: The 'Return to Normalcy', 1945-1953", in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the Soviet Union*, 129-56;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9), 289-97, 309-11；關於蘇聯戰後未能改革，參見Mark Harrison, "The Soviet Union: The Defeated Victor", in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d. Mark Harri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94-95。

⑭ 關於社會主義能否改革的爭論，參見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Stephen F. Cohen, "Was the Soviet System Reformable?", *Slavic Review* 63, no. 3 (2004): 459-88。

⑮ 關於共產黨政權合法性基礎的轉變，參見Dingxin Zhao,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 no. 3 (2009): 416-33。

⑯ Dingxin Zhao, "The Defensive Regime and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 no. 7 (1994): 28-46;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⑰ 一些研究相對局限於前社會主義國家，比如Gil Eyal, Iván Széleá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Ole Nørgaar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Re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0); 有的研究將前社會主義國家與其他地區進行比較，比如Mark R. Beissinger and Crawford Young, *Beyond State Crisis?: Postcolonial Africa and Post-Soviet Eur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2); Juan J. Linz and Alfred C.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⑱ 關於蘇聯的民族主義化，參見Nicholas S. Timasheff, *The Great Retreat: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Russia*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Inc., 1948);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關於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參見 Steven Saxonberg, *Transitions and Non-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Regime Survival in China, Cuba, North Korea, and Viet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7-35; John Kolsti, "Albanianism: From the Humanists to Hoxha", in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Eastern Europe*, ed. George Klein and Milan J. Reban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1), chap. 3 : 關於其他東歐國家·參見 George Schöpflin, "Nationhood, Communism and State Legitimat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 issue 1 (1995): 81-91。

⑲ 關於蘇聯建立民族國家的困境·參見 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20-29。

⑳ Lyn Spillman, "'Neither the Same Nation Nor Different Nations':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8, no. 1 (1996): 149-52.

㉑ Stephen Whit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Communist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38, no. 3 (1986): 462-82.

㉒㉓ Ding-xin Zhao and John A. Hall, "State Power and Patterns of Late Development: Resolving the Crisis of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28, no. 1 (1994): 211-29; 216.

㉔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關於越南革命戰爭與改革的關係·參見 Gabriel Kolko, *Vietnam: Anatomy of a Pea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㉕ Steven Saxonberg, *Transitions and Non-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119-27.

㉖ 中國的情況·可參見 Joseph Fewsmith, "Political Succession: Changing Guards and Changing Rules", in *China under Hu Jintao: Opportunities, Dangers, and Dilemmas*, ed. Tun-jen Cheng, Jacques deLisle, and Deborah Brow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6), 34-38;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 6 ; 蘇聯的情況·參見 Peter Kenez,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4-42。

㉗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57); Ota Šik, *The Third Way: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trans. Marian Sling (London: Wildwood House, 1976); George Konrád and Iván Szelé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trans. Andrew Arato and Richard E. All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Já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 Co., 1980).

㉘ Robert D.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